



新 诗

胡亮 著

ARCHEOLOGY OF MODERN
CHINESE POETRY

考古学



新诗考古学

ARCHEOLOGY OF MODERN
CHINESE POETRY

胡亮 著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阳光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新诗考古学 / 胡亮著. -- 银川: 阳光出版社,
2023.1

(阳光文库)

ISBN 978-7-5525-6612-3

I. ①新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随笔-作品集-中国-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22)第234570号

阳光文库·新诗考古学

胡亮 著

责任编辑 陈建琼

封面设计 尚书堂

责任印制 岳建宁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
阳光出版社

出版发行

出版人 薛文斌

地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(750001)

网址 <http://www.ygchbs.com>

网上书店 <http://shop129132959.taobao.com>

电子信箱 yangguangchubanshe@163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47283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0024894

开 本 880 mm × 1230 mm 1/32

印 张 7.75

字 数 180千字

版 次 2023年1月第1版

印 次 2023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25-6612-3

定 价 5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胡 亮

Hu liang

胡亮，生于1975年，诗人，学者，随笔作家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巴金文学院及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。现居蜀中遂宁。著有《阐释之雪》《琉璃脆》《虚掩》《窥豹录》《无果》《片羽》《朝霞列传》，主编或合编有《出梅入夏》《永生的诗人》《力的前奏》《敬隐渔研究文集》《关于陈子昂：献诗、论文与年谱》。获颁第2届袁可嘉诗歌奖、第9届四川文学奖、第3届建安文学奖、第1届任洪渊诗歌奖。

代序

让冲锋舟穿行于悖论两岸^①

各位来宾，各位朋友：

大家晚上好！

今天，我是初次来到邯郸，却像是故地重游，这个感觉令我十分享受。邯郸，包括邺城，乃是建安文学的圣地。就空间或地理学意义而言，我是初次来到邯郸；就时间或历史学意义而言，我已多次拜谒建安文学。获得本届建安文学奖，对我来说，就是获得了这样一个机会：让我可以再次向建安文学致敬，向邯郸大地上的诗意和文学生机致敬！

最早或较早向建安文学致敬，也许可以追溯到初唐诗人陈子昂。一千三百多年前，右拾遗陈子昂给左史东方虬写过一封信，其中两句话，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名言：“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，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。”陈子昂为什么会写这封信？因为他认为，东方虬隔

^① 此序本为《获奖辞——为“第三届建安文学奖”作》。

代继承了正始文学和建安文学。用今天的话来说，东方虬，当然还有陈子昂，已经打断了齐梁文学的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。

陈子昂的文学理论具有很彻底的“革命性”，其文学创作却具有很明显的“骑墙性”。钱锺书先生的《谈艺录》，早就说过这个问题。我认为，就文学或文学批评而言，“革命性”只是破坏时代的一个特征，先锋的一个特征，“骑墙性”才是建设时代的一个特征，高手或巨匠的一个特征。大多数诗人、作家或批评家，当然包括我，不可能轻易具有这个特征。但是，这个令人沮丧的现实，并不妨碍我在这里推介下面的理想——所谓文学批评，应该既包括广阔视野，又包括专注的立锥之地；既包括福至心灵的直觉，又包括数学般的计算能力；既包括孤独的民主性，又包括特殊的偏见；既包括严肃的判断力，又包括指东打西的幽默感；既包括毫无还价余地的道德律，又包括风情万种的文体学自觉。当然，批评家还要学会化解风骨与肌理之间的敌意，古典与现代之间的敌意，理性与感性之间的敌意，以及中学与西学之间的敌意，并且致力于废黜任何头戴冠冕的二元论。对于中国当代批评家来说，另有一个重要任务，那就是抓紧挽救写作与批评的“汉语性”，以便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十面埋伏中求得有分寸有尊严的突围。这个理想，太过高远。我知道我并未取得成功，但是，也并非全然失败。经过多次打折，或许，我至少可以做到这样一个程度——在面对小丑的时候，能够像松树那样倨傲于天空；而在面对至真、至善与至美的时候，能够像苔藓那样谦卑于大地。

刚才，我反复提到陈子昂，并非全然大公无私：因为陈子昂的故乡——四川射洪，既是家慈牟玉春女士的故乡，也可以说是我的小半

个故乡。

最后，我要祝贺朱涛（朱弱水）先生，祝贺臧棣先生！——两位诗人的想象力和语言创造力都令人动容，与他们分享本届建安文学奖让我心怀忐忑；我还要感谢建安文学奖的主办方，感谢所有评委，感谢温连明先生，感谢温建军（见君）先生，感谢杨碧薇博士，感谢今天来到现场的所有朋友！——杨碧薇博士为小书《窥豹录》撰写的授奖辞令人汗颜，我只希望，接下来的写作与研究不要过于辜负大家的厚爱！

胡亮

2020年12月4日

目录

半首诗，半部诗学

——读《中国新诗总论》 / 001

漂木即鲑鱼，鲑鱼即废墟

——读洛夫长诗《漂木》 / 019

“我不悲伤秋天从我开始”：安遇评传 / 040

“双舌羊约格哈加的馈赠”

——读吉狄马加长诗《迟到的挽歌》 / 073

游小苏以降

——四川大学的抒情传统 / 086

“人学万夏，诗学宋炜”：整体主义诗派索隐 / 127

半穿袈裟指南

——读陈先发短诗《再击壤歌》 / 169

换器官指南

——读蒋浩组诗《佛蒙特札记》 / 186

角色问题与时态问题

——读江非短诗《花椒木》 / 204

新诗去从论

——在遂宁国际诗歌周高峰论坛上的即兴发言 / 220

附录

胡亮文学简表 / 231

后记 / 239

半首诗，半部诗学 ——读《中国新诗总论》

1

新诗芳龄，已逾百年，来一番瞻顾，已然如此迫切而重要。在谢冕先生主持下，经过多位学者襄助，已编纂出版了两部巨著：十卷本的《中国新诗总系（1917—2000）》^①（下文简称《总系》），以及六卷本的《中国新诗总论（1891—2015）》^②（下文简称《总论》）。这两部巨著，分别着眼于诗与诗学（理论与批评），让百年新诗得到了较为精确而丰富的呈现。笔者深信，这两部巨著，不仅是当前最公允、最赅备、最成体系、最有担当的重要选本，而且必将在较长的时间段内被不断巩固为经典选本。

其实，《总系》前八卷着眼于诗，末两卷——亦即理论卷和

^①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年版。

^②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9 年版。

史料卷——也以较大篇幅兼顾了诗学。某种意义上说，《总论》就是对《总系》末两卷的有限扬弃和大规模增补，甚而至于，已经达臻了两骏连辔的程度。

《总论》仍然由谢冕担任总主编，分为六卷，第一卷（1891—1937）由姜涛先生担任主编，第二卷（1938—1949）由吴晓东先生担任主编，第三卷（1950—1976）由吴思敬先生担任主编，第四卷（1977—1989）由王光明先生担任主编，第五卷（1990—2015）由张桃洲先生担任主编，第六卷亦即翻译卷由赵振江先生担任主编。这七位编者，老中青联袂，可以说是荟萃了一时硕彦。

“吾爱吾师，吾更爱真理。”虽然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自诩真理在握，笔者仍将赞美——并挑剔——这部巨著；在挑剔的时候，也就暂时顾不得七位编者所付出的巨大心力。

2

首先，要谈谈反方的缺席与有限出场。

新文化运动——包括白话诗运动——已经获得了充分的合法性，关于这个运动的历史书写，早就成为一种典型的雄辩书写。在这样的雄辩书写中，反方不断退场，乃至最终缺席。“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。”^①想想看，胡适的反方安在？陈独秀的反方安在？梅光迪与任叔永安在？他们早已成为历史的逆流，学

^① 陈独秀《再答胡适之》，《独秀文存》，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689页。

术的背影，仅在被批判的时候才被挪用作瓦碎的宾语。

然而，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大获全胜，其过度后果也开始逐渐显现。我们当然认可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使命，却也不妨稍微反思这种启蒙的过度后果（甚至可以称为消极后果）。新文化运动的消极后果，总而言之，就是传统虚无主义，分而言之，就是语言上的白话原教旨主义和文化上的西方中心主义。从文学本体论的角度来看，本文更为关心的白话诗运动，原本不必额外负担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使命，也不必额外承受这种启蒙的消极后果。然而，事实恰好相反：白话诗必须扮演启蒙的先锋，甚而至于，革命的先锋。胡适和陈独秀，从来不是就诗论诗，他们关于诗的过激主张，如果剔除了启蒙或革命诉求，幸存下来的诗学价值已经极为有限。

已经养成了习惯的雄辩书写，其可怕之处在于，对诗学价值与启蒙价值（或谓思想史价值）的评估往往缠夹不清。比如，我们肯定了胡适和陈独秀的启蒙价值，却在无意间大为拔高了其诗学价值。又比如，我们否定了学衡派的启蒙价值，却在无意间大为贬低了其诗学价值。学衡派，继承梅光迪与任叔永，恰是胡适和陈独秀的绝对反方。如果我们仅仅着眼于诗学价值，到了今天，定然会叹息着承认：学衡派诸公实在远超白话诗诸公。随着前述消极后果的不断显影，学衡派的诗学价值必将越来越醒目地显现在我们面前。

最为经典的例证，就是以文言写就的《评〈尝试集〉》（胡

先骖)。胡先骕正是学衡派的大将，他关于《尝试集》的论断，既能融化新知，又能昌明国粹，确实具有不激不随的态度和风度。关于《尝试集》，这篇两万字的雄文，算得上是最为详尽而公允的研究。然则诗学上的公允，却被视为启蒙上的保守，故而此文长期被弃如敝履。笔者很兴奋地看到，几经犹豫，姜涛还是将这篇雄文选入了《总论》。在长期缺席以后，这算是学衡派的有限出场。

学衡派的主帅，并非胡先骕，而是更加了不得的吴宓——他却反而彻底地缺席于《总论》。吴宓曾多次论及白话诗或新诗，虽然大异于胡适和陈独秀，却别有超越时代和地域的意义（亦即文学本体论意义）。可以参读的诗论，至少当有亦以文言写就的《论新文化运动》《论今日文学创造之正法》《论诗之创作》《诗韵问题之我见》《挽徐志摩诗附识》。而吴宓的《空轩诗话》，虽然以同时代旧体诗为讨论范围，却向我们推荐了一位与新诗相关的重要人物——常乃惠，此君擅长七言歌行体，所作《论新诗》，乃是以旧诗论新诗的妙文，先后论及胡适、康白情、俞平伯、冰心、刘大白、郭沫若、汪静之、徐玉诺、陆志韦、吴芳吉，堪称以七言歌行体写就的新诗草创史。虽然常乃惠——包括吴宓——对新诗很失望，“旧统已溃新未成，诗运国运亦同尔”，却也有展望，“诗成雪泪望将来，早见韩潮与苏海”^①。可见学衡派，并非保守派，而是会通派，他们全都精通左右互

^① 《常乃惠将军歌与论新诗》，《空轩诗话》，《吴宓诗话》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，第240-241页。

搏之术。对这段历史，姜涛素有研究，然而笔者仍然不满足于他的分寸感。学衡派诸公，对新文化运动——包括白话诗运动——给出了及时而有针对性的提醒。到了今天，或可将当时的无效提醒，大张旗鼓地转换为及时的有效提醒。

3

第二，要谈谈理论与批评。

无论古今中外，理论与批评，都是诗学之双翼。单就新诗而言，理论与批评，却有南阮北阮之别。批评文集是有很多，新诗史亦有不少，体系化的理论专著却甚为鲜见。《总论》也呈现了这个瘸腿般的事实：我们从不缺乏批评的包厢，却似乎并未建立理论的堂庑。

体系化的理论专著，屈指数来，也就那么几部。我们已经看到，朱光潜的《诗论》，王力的《汉语诗律学》（更多讨论古典诗律），都已经进入了《总论》的视野。吴晓东选入了《诗的境界——情趣与意象》（朱光潜），而吴思敬选入了《中国格律诗的传统和现代格律诗的问题》（王力）。除了《诗论》与《汉语诗律学》，值得关注的理论专著，笔者以为尚有蓝马的《前文化导言》，李震的——不是《母语诗学纲要》——而是《神话写作与反神话写作》（虽然此文沾染了一点儿二元论的恶习），也许还有敬文东的《感叹诗学》与《味觉诗学》（但是这两部书都超

出了《总论》的时间下限)。

关于蓝马的《前文化导言》，长期以来，坊间以讹传讹，学界将错就错，现在已经成了一笔糊涂账，一宗无头公案，笔者非常乐意借此机会还原真相。1986年，蓝马与周伦佑商议创办《非非》，约定由蓝马起草《前文化导言》，周伦佑起草《非非主义宣言》。蓝马如期完成《前文化导言》，分为七节：“前文化与文化”“前文化语言与文化语言”“前文化思维与文化思维”“前文化的文学观和艺术观”“前文化与非非艺术”“前文化的美学原理”，以及“非非诗歌中的前文化还原”。然而周伦佑却没有完成任务，两人商议，临时抽出《前文化导言》第五节，当作《非非主义宣言》，署名“蓝马执笔”；又临时抽出《前文化导言》第七节，经周伦佑小改，当作《非非主义诗歌方法》，署名周伦佑、蓝马。《前文化导言》最终只保留了前四节，与《非非主义宣言》，《非非主义诗歌方法》，一起刊发于《非非》创刊号，看上去就像毫无瓜葛的三篇文章。1987年，蓝马续写完成最后三节：“作为精神命运的取向活动的前文化观念”“作为文化成就的内化结果的文化观念”，以及“太阳法则与矛盾法则”。至此，《前文化导言》有了十节，可以说，既是诗学专著，又是哲学专著，还是语言学专著。蓝马当时读过维特根斯坦（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），却不知巴特（Roland Barthes）为何方神圣，然而他却以维特根斯坦式文体，未卜先知般地阐述了巴特式问题。笔者的意思是，《前文化导言》乃

是一部具有高度原创性^①的理论专著，暗合并呼应了二十世纪世界哲学的语言学转向。就在参差同时，蓝马还完成了《什么是非非主义》《前文化系列还原文谱》《形容词与文化价值》《非非主义第二号宣言》《语言作品中的语言事件及其集合》《语言革命——超文化》《新文化诞生的前兆》等文章，均可作为《前文化导言》的注脚^②。如果说周伦佑是中后期非非派的“心脏”，那么蓝马就是早期非非派的“灵魂”，《总论》对他的“罔顾”，也许是一个较为重大的遗憾。

4

第三，要谈谈细读与宏观诗学。

细读与宏观诗学并非截然对立，可以说，前者是雕虫，后者是雕龙，前者是后者的柱础，而后者是前者的帷幕。但是，为了论说的方便，笔者权且将细读的对象设定为某件作品，而将宏观诗学的对象设定为某种程度上的共性问题或苗头性问题。也就是说，细读乃是修辞或语义分析，而宏观诗学则必然落实到问题或向度研究。

在白话诗和新诗的草创期，谈论问题，选择向度，才是要事与急务，故而不得不热衷于雕龙的壮举。与这样的草创期相适应，

① 蓝马却对笔者说，其观点，早就被佛陀说得更加深刻而圆通。笔者经查《金刚经》，确证“非非”亦是旧词。

② 蓝马听取笔者建议，已将《前文化导言》恢复原貌。参读《海水与浪花》，《蓝马诗文集》，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。

笔者很是期待，《总论》应该更多地展示宏观诗学成果。这七位编者，果然也以很多次重彩，较为清晰地呈现了百年来宏观诗学的大关节：白话，自由体，新形式与新格律，象征派，现代派，散文化，大众化与民族化，政治讽刺诗，朗诵诗，象征、玄学与现实的综合，古典加民歌，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，孤悬的现代性（台湾），再启蒙，人性与主体性，女权，叙事性，后现代性，唯修辞，以及静悄悄的传统和汉语自觉，可惜仍未涉及越来越重要的生态诗学。这些大关节有先后，有反复，有交叉，有回旋，却基本上重现了诗与诗学的真相。

几乎到了最近三十年，在雕龙的壮举而外，才有了雕虫的闲暇，顺势也就出了几位颇具细读能力的学者（比如孙玉石、陈超、江弱水、臧棣、西渡和更年轻的一行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王光明和张桃洲先后选入了孙玉石关于建立解诗学的两篇文章，张桃洲甚至直接选入了对《诗八首》（穆旦）和《镜中》（张枣）的细读文章，究其用意，似乎关注细读客体（穆旦与张枣）甚于细读主体（王毅与冷霜）。这甚至可以牵出另外的话题，比如，《总论》虽然并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，但是也不排除顾此失彼的单方面考量。

而诗人论，则介于细读与宏观研究之间。笔者个见，对重要诗人，均当选入至少一篇诗人论，而且还当是对这个诗人素有专攻的学者所结撰的诗人论。姜涛选入《徐志摩论》（茅盾），开了个好头，可惜各卷的跟进并不均衡。笔者乐意给出这样一份诗人名单，并期待在《总论》里面读到精湛的诗人论：郭沫若、鲁迅、徐志摩、戴望舒、冯至、艾青、卞之琳、穆旦、余光中、洛夫、痖弦、昌耀、北岛、多多、顾城、